

刘和平 著

翻译学：

口译理论和口译教育

Translation Studies:
Interpretation Theory
and Education

人文
学术

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

谢天振 王 宁 主编

翻译学： 口译理论和口译教育

刘和平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学:口译理论和口译教育/刘和平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8
(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谢天振,王宁主编)
ISBN 978-7-309-13123-9

I. 翻… II. 刘… III. 口译-研究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73938号

翻译学:口译理论和口译教育

刘和平 著

责任编辑/庄彩云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出版部电话:86-21-65642845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1.25 字数 262千

2017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13123-9/H·2742

定价:5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总序

中国的翻译研究可谓源远流长,历史上长达千年的佛经翻译不仅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佛经翻译家,同时也催生了我国古代的翻译研究和相应的翻译思想。这些翻译思想,从三国时支谦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到东晋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从六朝鸠摩罗什的“依实出华”,到唐代玄奘的“五不翻”,尽管多属片言只语,零篇残什,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翻译思想弥足珍贵,仍然可以为当今的译学建设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像唐代贾公彦关于翻译的定义“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即使从今天的译学高度看,也堪称经典。

自从严复于1898年提出了“信达雅”三字以后,这三个字对我国的翻译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差不多长达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的翻译研究,或是讨论怎样翻译才能做到“信达雅”,或是以“信达雅”三字为标准去评判已有的翻译作品,或是探讨“信达雅”的内涵和外延,等等,几乎到了言必称“信达雅”的地步。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虽然傅雷提出了“神似”说,钱锺书提出了“化境”说,但其思想实质,严格而言,与“信达雅”说其实并无二致,孜孜以求的也就是要解决一个“怎么译”的问题。然而与此同时,同样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方译学界却发生了一场根本性的变化:以奈达、纽马克、卡特福德为代表的一群学者站在语言学立场上,运用语言学的相关理论视角切入翻译研究,提出了“功能对等”、“交际翻译”、“语义翻译”等概念,刷新了两千年来的西方翻译研究的面貌,实现了西方翻译研究的第一个根本性的突破。

与西方相比,中国当代翻译研究的根本性转变,也即从传统译

论进入现代译论,具体而言,也即从仅仅关注“怎么译”的问题拓展到还要关注“何为译”、“译为何”等问题,时间上要晚一些,其起点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其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我国外语院系的师生和专家学者第一次有机会走出国门,赴美英等西方国家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深入访问、进修学习,其中对翻译研究感兴趣的专家学者首先接触到了以奈达为代表的西方翻译研究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并在国内的学术期刊、大学学报上撰文评说,把他们了解到的信息传递给国内同行。这些文章部分结集成《外国翻译理论评介文集》^①于1983年出版,并与翌年编译出版的《奈达论翻译》^②一起,第一次比较多地介绍了外国、主要是西方以及苏联的当代翻译理论,从而为国内的翻译研究吹进了一股新风。之后,随着《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③、《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④、《翻译与后现代性》^⑤、《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⑥等编译著述的出版,更进一步推动并扩大了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与此同时,从21世纪初开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这南北两家外语出版社先后分别引进了数十种当代国外翻译理论著作的英文原版本,让中国读者可以直接面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英文原著,其产生的影响同样不能小觑。

①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选编:《外国翻译理论评介文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年。

② 谭载喜:《奈达论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

③ 许钧主编:《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共收入四本,分别为《当代美国翻译理论》(郭建中编著)、《苏联翻译理论》(蔡毅、段京华编著)、《当代法国翻译理论》(许钧等编著)、《当代英国翻译理论》(廖七一编著),湖北教育出版社,分别于2000年、2001年出版。

④ 廖七一编著:《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译林出版社,2000年。

⑤ 陈永国主编:《翻译与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⑥ 谢天振主编:《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共收入八大译学流派33篇译学论文译文,均配以导读文章,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当代的翻译研究也开始发生变化,并朝着实现其根本性转变的方向而发展。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翻译学学科意识的觉醒上。在此之前,尽管中国的翻译活动也称得上丰富多样,译者和译作的数量更是堪称世界之最,中国的高等院校里也都开设了翻译课程,但相当多的人包括高校的一些教师和学生对于翻译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却不甚了了。不少人依然错误地认为,翻译不过就是把别人的东西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实践性技能,缺乏自身的原创性,不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他们看不到原本在一个有限的语言环境中产生有限影响的“原创性”著述通过翻译在另一个语境里得到的更大的传播和接受,甚至产生的更巨大的影响。他们更看不到最近几十年来,翻译本身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越来越得到来自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视角的关注和考察。翻译研究借助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阐释学、女性主义以及文化研究等领域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已经突破了语言中心主义的狭隘模式,而成为广义的文化研究平台下的一个分支学科领域。翻译研究也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哲学家、语言学家、文学理论家和文化研究学者,甚至包括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关注目光。翻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学界的共识。与之相应,在中国经历了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翻译学的大讨论后,终于在 21 世纪之初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得到了体制内的承认:目前已有 159 所高校建立了翻译硕士专业(MTI),另有一百余所高校建立了独立的本科层面的翻译系。此外,多所高校还都招收翻译学的博士生。

其次,体现在翻译研究理论意识的觉醒和跨文化研究视角的应用上。在中国,自清末民初以来的翻译研究多围绕文学翻译展开,而在文学翻译界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是:翻译是一门艺术,或者说是一种具有再创造性质的艺术,于是翻译理论也就被定位在建基于这样一种艺术实践中获取的经验之上,并反过来要求其能够指导翻译实践。由于这个原因,中国自近代以来的翻译研究,大

多是围绕着翻译实践展开的一些经验体会,并无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可言。但是随着翻译学这门学科在最近几十年来的日臻成熟,当今的翻译研究开始越来越多地跳出原先局限于语言文字转换框架内的“术”的层面,而越来越多地上升到关于翻译的思想和原则的“学”的层面。这样的翻译研究成果往往能够改变人们对某种既定的翻译行为、标准、方法等的看法,导致一种新的翻译实践模式的诞生。不难想见,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翻译必将继续占据人类知识领域的重要位置,并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因此,传统的居于对比语言学之下的翻译的定义应当根据翻译的最新发展进行修正和完善,翻译的内涵应该进一步扩大,要把翻译从纯粹字面意义的转述定义为文化层面上翻译、阐释和交际。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中国学者的翻译研究成果,如谢天振的《译介学》^①、《隐身与现身——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②,王宁的《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③、《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④,许钧的《翻译论》^⑤等著述所作的研究,正好契合了当今国际译学的最新发展趋势,并站在中国学者的独特立场,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

再次,体现在对翻译史研究和翻译批评研究的高度重视上。在此之前,中国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史著作,对翻译史的研究同样少之又少。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在翻译文学史、翻译史的编撰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迄今为止,翻译史类的著述已经超过30部。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对翻译史的研究也取得

① 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2013年译林出版社推出该书的增订本。

② 谢天振:《隐身与现身——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③ 王宁:《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中华书局,2006年。

④ 王宁:《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⑤ 许钧:《翻译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了长足的进展,王宏志的《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①、《翻译与文学之间》^②,廖七一的《胡适诗歌翻译研究》^③、《中国近代翻译思想的嬗变》^④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与此同时,作为翻译学学科三大支柱之一的翻译批评同样得到了高度重视,许钧的《文学翻译批评研究》^⑤较早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最后,中国学者也没有遗忘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视角,他们同样在这一领域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并取得了不俗的成果,如黄国文的《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探索》^⑥和王东风的《连贯与翻译》^⑦等著述。

然而,尽管最近二三十年来我们在翻译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的一些学者还在国际翻译研究或文学和文化研究刊物上主持过介绍中国翻译研究的专号^⑧,但是总的说来,由于语言文字的隔阂,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学者的译学研究成果并不是很了解。而由于传播的局限,甚至国内读者对于哪些学者和哪些著述能够代表中国翻译研究的前沿也不是很清楚。为此,我们决定编选一套翻译研究丛书“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集中展示中国当代翻译研究学者的代表性论著。我们将先推出“文库”的中文版,

① 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

② 王宏志:《翻译与文学之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③ 廖七一:《胡适诗歌翻译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④ 廖七一:《中国近代翻译思想的嬗变》,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⑤ 许钧:《文学翻译批评研究》,译林出版社,1992年。

⑥ 黄国文:《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探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

⑦ 王东风:《连贯与翻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

⑧ 如王宁为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Neohelicon*, *Amerasia Jour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等十多家国际英文期刊主编了翻译研究与文学和文化研究方面的专辑,许钧与王克非也为 *META* 主持过“中国翻译实践与理论”的专号,等等。这些专辑不仅发表了数十位中国学者研究翻译的论文,同时也加快了中国人文学科国际化的步伐。

然后推出它的英文版,在国外著名出版社出版。入选本“文库”的作者应该是能够代表当代中国翻译研究的前沿,其著述不仅在国内译学界处于领先地位,其中的一些论述也已经或者有可能引起国际学界关注,进而通过将来英文版在国际权威出版社的出版,使得中国的翻译研究进一步得到国际学界的了解和承认。在甄选“文库”的入选人选时,我们也考虑有不同学术背景、不同学科背景、不同外语语种的作者,尽量使入选的作者更具代表性。首批入选的六位作者既有比较文学学科背景,也有语言学背景;既有外国文学背景,还有中国文学背景。在外语语种方面,除英语外,还有俄语和法语背景的学者。入选的论文集原则上由作者本人从他已经公开发表的论文中精选出 15—20 篇的代表性论文,按内容编成三至四个部分,每本书的总字数控制在 20 万字左右。

“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第一辑入选的六位作者的论文集标题分别是:谢天振的《超越文本 超越翻译》,王宁的《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许钧的《从翻译出发:翻译和翻译研究》,王宏志的《翻译与近代中国》,廖七一的《翻译研究:从文本、语境到文化建构》,王东风的《跨学科的翻译研究》。在条件成熟时,我们还将陆续推出第二辑和第三辑。我们希望通过本“文库”的编选和出版(包括在国外权威出版社出版),不仅能为当代中国的翻译研究作出贡献,同时还能把能够代表中国译学研究前沿的专家学者及其代表性著述带入国际翻译研究界,让世界更直接、更快捷地了解中国的学术,让中国翻译界的学术研究切实有效地走出国门。

谢天振 王 宁

2014 年 2 月于上海

《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第二辑说明

如上所说,《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所以这次我们又推出了第二辑。这一辑我们收入了三本论文集,分别是谭载喜的《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的求索与发展》、赵稀方的《翻译与现代中国》和刘和平的《翻译学:口译理论与口译教育》。三本论文集各具特色:近三十年来一直专注于国内翻译学学科建设的谭载喜教授把他在这方面的思考汇编成一集,供读者全面了解他探讨翻译学学科建设的全过程;中国文学研究出身、主治台港澳文学与文化研究的赵稀方在他的论文集里,不仅考察了1949年前后翻译与现代中国文化建构的关系,还上溯探源,对晚清五四期间中国翻译的流脉进行了清理;而巴黎高翻口译博士出身的刘和平,其研究目光自然是集中在口译的理论与教学领域。在翻译研究领域,口译研究是最不易触碰的一块研究领域,而刘教授历年来发表出版的有关口译研究的论著则给翻译界的同仁诸多启迪。我们希望这次集中推出的三本论文集能对当前国内方兴未艾的翻译研究有所裨益,同时也希望这三本论文集能得到国内外翻译界和翻译教学界相关研究人员和广大师生的喜爱。

谢天振 王 宁

2017年8月于上海

前 言

四十多年,光阴如梭,转瞬即逝。回想自己的职业生涯,简单而平实:译者/译员、教师、研究人员。口笔译实践为教学服务,实践中遇到问题引发阅读思考,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手段。我于1982年本科毕业后留校教书,遇到诸多新问题,困惑萦绕,百思不得其解。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目的是寻找汉外口译更为有效的教学模式与方法。1996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至今,书不离手,思无间断,自始至终关注的是翻译实践与教学,以及相关的理论问题。

多年的口译与教学实践和研究让我感触颇深。口译实践与口译教学的关系、口译研究与教学研究的关系,亦或称口译理论与口译教学实践的关系、翻译教学法和翻译人才培养模式等问题成为我关注的焦点。

一、坚持自己的研究方向,不断拓展研究视角

1994年我与鲍刚在《中国翻译》共同发表《技能化口译教学法原则》,同年在《国际关系学院学报》发表《口译课程教学纲要》,1996年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发表《法汉-汉法口译教学研究》,同年在法国巴黎完成博士论文答辩,论文题目是“中国外语类院校口译教学——以汉法和法汉为例”。

1996年回国后,我应邀参加11月在南京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召开的“全国首届翻译理论与教学研讨会”并做主旨发言,题目是“翻译的动态研究与口译训练”,主要内容是:翻译描述和对比研究取得了很大成果,翻译行为结果研究——静态研究也不断深入,这为翻译批评和翻译标准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翻译研

究应该加强对翻译过程的动态研究,即加强对译者这个跨文化交际主体的研究,因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心理和认知特征对解释和描述翻译活动规律至关重要,而对翻译过程的描述和研究对翻译教学意义重大。

1998年本人应邀参加“全国第二届翻译理论与教学研讨会”,发言题目是“再论教学翻译与翻译教学——从希拉克信函的翻译谈起”,论文后经修改在《中国翻译》发表。其主要内容是:从对希拉克信函翻译的分析入手,阐述语言翻译同职业翻译的差别,说明不同层次的翻译不仅有不同的功能和作用,而且思维模式存在差异。语言翻译停留在语言涵义的对应层次,语言教学旨在培养语言能力。职业翻译寻求语篇意义的对等,翻译教学是借助语言能力培养翻译能力。语言翻译只要求语言能力,职业翻译除语言能力外,还需要相应的认知知识和分析综合等能力。语言教学不是翻译教学,更不能替代翻译教学。

在后来的几年中,从口译的动态研究到对口译教学大纲等主题的思考,包括科技口译和新形势下的口译新形式及译员角色,本人的主要思考一直围绕着口译教学和口译的跨文化问题。这期间主要发表论文如下(按时间顺序):《职业口译程序与翻译教学》《口译理论与教学研究现状与展望》《口译与翻译学》《科技口译质量评估标准》《关于制订口译统一教学大纲的理论思考》《思维科学与口译程序》《口译的技能意识与口译教学》《职业口译新形式与口译教学》《译员在跨文化交流中的新角色:从一家合资企业股份回购谈起》《翻译教学方法论思考》。

2001年出版专著《口译技巧——思维科学与口译推理教学法》,2005年出版另一本专著《口译理论与研究》。根据徐子韵等^①

^① Xu, Z., & Archambault, É. (in press). *Chinese interpreting studies structural determinants of MA students' career ch. Scientometrics* (2015) 105: 1041-1058 DOI 10.1007/s11192-015-1717-0.

关于口译专著和论文影响力的研究,这两本书的影响力(引用率)在全国口译研究类别中分别排在第二位和第五位。随着中国口译与教学研究的深入,本人的思考也从宏观开始进入专题研究。2005年和2015年先后两次发表有关口译理论研究成果与趋势的研究(第二篇与我的博士生合作完成),间隔10年,主要目的是通过梳理、了解国内口译研究现状和问题,思考应该在哪些方面继续深入研究。其他论文的选题主要围绕口译研究与口译教学的关系、市场需求与口译教学的关系、教学模式和课程体系建设和翻译能力研究,期间对法国释意理论的专著和论文及其发展脉络和成果进行了梳理,还出版了《法语口译教程》(学生和教师用书各一本)。

从这些年发表的论文题目可以看出,本人博士论文撰写前后选定的研究主题贯穿始终,而且研究不断深入。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源于早期的口译教学实践,在教学中遇到问题后很困惑,试图通过撰写博士论文和读书进行思考,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然而,博士论文只是研究的开始,不是结束。我国一些博士生的状况的确令人惋惜。穆雷在2014年发表的论文中对国内(大陆、港、澳、台)近700篇博士论文的考察分析后指出:“从总数上看,还有226名博士(占36.2%)从未发表过与其博士论文相关的文章,有81名博士(占13%)从未发表过翻译研究方面的文章,而且这些博士所从事的大部分工作仍然是翻译学、语言文学及比较文学等语言文学类专业。”(2014: 19)

另外,我在搜索论文时还发现:不少人研究方向过于多元,东一斧头,西一榔头,主攻方向不明确。如前所言,除翻译学本体研究外,语言学和文学,特别是比较文学与翻译息息相关,跨文化研究、心理学、认知心理学、信息学、教育学、现代技术应用等与翻译均密不可分。但无论如何,翻译研究者都应该把翻译放在核心位置,从不同学科角度进行跨学科研究,比如神经学和认知心理学。翻译研究者还应与这些领域的专家合作,如TRIEST大学的口译研究团队,共同就翻译学感兴趣的问题进行研究,而不是离开翻译

研究“遍地开花”或“广种薄收”。目前的口译研究缺乏的是不同专业背景的专家与翻译研究人员的合作。

从学术伦理角度看,还有一种现象必须避免:一文多发。职称评审、申请项目、评优评奖等,这些与研究没有直接关系,不能因此影响自己的研究方向,更不能为求数量将一文“解剖”,重复发表。作为一个研究者,这应该是道德底线。正因如此,我几十年的研究课题相对集中,很少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

二、处理好口译研究与口译教学实践的关系

本人一直从事口笔译实践,翻译过文学作品和理论专著,也为外国企业翻译了大量的科技资料。无论是一般会议的交替传译,还是谈判口译,总数不低于100场次;我先后为联合国人口大会、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联合国环境署“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等做过同声传译,也为法国咨询公司做过多场次品牌市场调研的同声传译。这些翻译实践为教学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和经验。

读博前,我已开始教授口译,但一直有疑问,不知道在几年的时间里用何种方法培养出合格的口译人才。带着这些疑问我进入新索邦第三大学巴黎高等翻译学校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当时遇到的最大理论问题有两个:按照释意理论,学生在没有娴熟掌握工作语言情况下不能学习翻译,更不能学习口译;另一个则是国际惯例,只能教授B或C-A翻译,反对A-B翻译。我当时非常纠结,因为在我的论文题目中既有法译汉,也有汉译法。如何确定和评测中国学生母语和外语水平、如何在口译教学的同时帮助学生提高语言能力成为不可逾越的问题。经过几年的阅读和研究,以上两个理论问题都找到了基本答案,因此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但研究并没有结束,因为理论上解决的问题不一定在实践中行得通。从《论口译教学与语言教学的差异及口译教学的系统化》到《译前准备与口译质量——从口译实验课谈起》,再到《中译外:悖论、现实与对策》《口译认知与口译训练》,随着学生来源和专业方向的变化(从外语专业到翻译专业),语言与认知的关系、中译外等

问题逐渐进入我的视线,教学中发现的问题和遇到的困难又成为了研究的动力和方向。我借助多年的翻译实践和研究,最终发表了《翻译能力阶段性发展特征与教学法研究》一文,尝试着处理学生能力发展和实现口译教学目标的关系、解决教学中诸多实际操作问题,而《法语口译教程》的出炉又是教学实践和教学法研究的成果。

口译研究成果不仅对口译教学有影响,对口译实践也有促进作用,正如王斌华和穆雷所言:“(1) 口译研究在提升口译活动及译员的社会地位方面起到了明显的作用。译员不再被简单地看作是语言转换的‘机器’,而是和其他行业的人士一样是从事复杂脑力劳动的职业人员。在这方面,以塞莱丝柯维奇为首的‘巴黎高翻’的口译研究者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2) 口译研究激发了对口译活动的持久思考与探索,并催生了如今在口译教学和实践起指导作用的一些原则(如巴黎高等翻译学校的‘脱离源语外壳’原则、吉尔的‘认知负荷’理论等)。这些思索还可能催生新的理论,并成为以后研究中实证检验的对象。(3) 口译研究促进了口译实践者对其实践进行系统的考察和反思,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研究与实践的良性互动。(4) 虽然口译研究尚不能宣称已取得了‘革命性的’重大发现,但对口译以下诸方面的探索都有了一些‘相对客观的、以科学数据为基础的’研究文献。如关于口译质量已有文献证明,用户对口译质量的期望存在差异,口译质量评估应考虑诸多变量;关于口译表现已有文献证明,译员在不同条件下口译同一源语语段时,口译表现会有所不同;关于译员的‘工作记忆’已有文献证明,译员的工作记忆容量与非译员的不同;关于口译中使用的‘语言策略’已有文献证明,不同的语言组合,使用的语言策略有所不同,等等。”(王斌华、穆雷:2008:86-87)

三、研究方法要与研究内容相吻合

按照霍姆斯(2007:18)的分类原则,口译教学研究属于应用理论研究。总体来讲,实证研究和描述性研究都有必要。论文《译前

准备与口译质量——从口译实验课谈起》试图通过实验证明,学生译员的译前准备对口译质量有明显影响,或者说,用数据证明认知知识、语言知识与口译质量的关系;论文《2004—2013年中国口译研究的发展与走向》意在借助数据分析了解口译研究动态、研究主题和方法,从而思考下一步研究的方向。论文《翻译思辨能力发展特征研究——以MTI翻译理论与实务课程为例》采用了观察法、调查法和访谈法,用数据证明思辨能力发展特征,证明理论类或知识类课程同样可以训练学生的思辨能力。该研究经过对五轮课程的观察,随后又在本科阶段进行两轮授课,撰写了“翻译专业本科—硕士学生思辨能力发展特征对比研究(王茜、张培欣,待发表),对最初的实验结果进行了反复验证,论文给出的结论基本能够反映学生学习和教学现状。2002年前后,国内不少教师认为,学校性质不同,教学对象不同,教学时数和要求等不同,因此应该制订完全不同的教学大纲。为此,我撰写并发表了《关于制订口译统一教学大纲的理论思考》一文,试图解答大家的疑问,从理论高度阐述制订口译教学统一教学大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翻译能力发展的阶段特征性及其教学法研究》正是对多年口译教学的思考。我在教学实践中先后遇到了很多问题或困难,例如交替传译笔记课给学生和老师制造了不少麻烦:不做笔记时学生基本可以完整并清晰表述听到的信息,一旦使用笔记,学生变得既不会听也不会记笔记了;开始教授笔记的方法也很失败:用几个课时系统介绍笔记记录方法,告诉学生为什么记笔记、如何记笔记等,但到头来学生看不懂自己的笔记,更无法进行表达;课堂上把握不了何时讲解、如何讲解,学生口译中我经常插嘴、点拨或提醒;应该重点讲如何聆听信息的时候,我又不自觉地插入大量针对表述问题的讲评,甚至还放下口译训练,对表述中出现的语言问题纠缠不休;刚开始觉得,上课使用录音或录像会更真实,但真实材料的难度大大阻碍了学生的理解,又很难找到合适的材料,结果是口译课完全变成了语言进修课;还比如,开始不十分重视主题知识与语言知识的关

系,觉得把重要的单词教给学生就可以解决理解或表达问题,没有要求学生做充分的译前准备,其结果可想而知。教学实践中出现的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研读相关理论著作,也需要根据理论著作提供的原则或方法进行反复实验,努力寻找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这期间,对学生的观察、访谈、问卷调查,对成绩的分析,到兄弟院校取经,参加研讨会等都会有助于思考,有助于发现问题,也为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开拓新思路。

《政产学研:语言服务人才培养新模式探究》于2014年在《中国翻译》发表。论文撰写的背景是:开设翻译专业的高等学校数量在不断增长,但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与原来的外语教学始终没有本质区别,毕业生离开学校后真正从事专业翻译的人数不多,导致的结果是,这个新专业在社会上失去其影响力的可能性隐约出现。另外,一份研究生毕业论文调查报告表明,在很多开设翻译专业的学校中,90%的学生没有机会参与真正意义的翻译实习!与此同时,语言服务行业对翻译专业本科和MTI毕业生批评有加,对高校的责怪声不绝于耳。象牙塔“闭门造车”培养不出社会需要的人才,用人单位对翻译教育了解甚少。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作为行业管理部门,又该做些什么?国外已经非常重视校企联合办学,我们如何借鉴国外的经验?如何培养社会需要的语言服务人才?论文强调,翻译教育应该真正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用人单位应该积极参与高校教学大纲的制订并承担一部分课程,高校教师应对翻译课程和教学方法进行改革,中国译协应在校企之间搭建桥梁,全方位办学,一条龙式办学,逐渐解决办学目标和办学模式问题,这样才能培养社会需要的语言服务人才。

本论文集第二编“口译理论与教学研究”部分以论文发表时间排序,旨在呈现作者遇到的问题和思考路径,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中国口译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在编辑本论文集时由于排版等原因,对原论文格式和编码(汉注释和参考资料等)进行了部分调整。